

清末小説から

1999.1.1

附録

52

【書評再録3】

清末民初小説数量的最新統計……………寧 稼雨 1
 鍥而不捨 金石可鏤——讀《新編

清末民初小説目錄》後 ……………汪 家熔 2
 從《新編清末民初小説目錄》

看到和想到的 ……………汪 家熔 9

近代小説知多少 ……………夏 曉虹12

★中国で発表された『新編清末民初小説目錄』
 に関する書評の再録第3弾です。文章は、原文
 のままですが、ページ全体を縮小拡大している
 場合があります。初出誌名は、文頭に明記しま
 した。資料提供には、夏曉虹氏に感謝。樽本☒

清末小説研究会 日本〒520滋賀県大津市打出浜8番4-202 樽本照雄方

【初出：『文匯讀書周報』1998.7.4】

●寧稼雨

清末民初小説数量的最新統計

近日读了《文匯讀書周報》第672号(1998年1月10日)第四版周振鶴先生所撰《清末民初出了多少小説》一文。该文以日本学者樽本照雄1988年所编《清末民初小説目錄》为依据,谈日本学者在材料整理方面的精确和细致,笔者十分赞成。文章结尾处说:“1988年,《清末民初小説目錄》已在一衣带水的彼岸编了出来,但他们并不满足,现在仍在继续修订增补之中,……”

我要为周先生的文章补充的是,樽本照雄先生的修订增补工作已经有了结果。他的《新編清末民初小説目錄》已经于1997年10月由日本清末小説研究会出版发行。笔者有幸得到著者贈书一册,

现将新编本的主要信息披露于此,以飨读者。

新编本的收录范围是截至1997年5月在海内外出版、再版、重版、影印的1912年——1918年之间中国创作和翻译小説目錄。其中,创作小説11040件,翻译小説4974件,总计16014件。编者在新版序言中称新版是旧版的1.7倍。笔者手里没有找到旧版,但根据编者序言所称的“1.7倍”,那么旧版的小説数量总共大约应当是近10000件。但这个数字与周先生文中所列总共2304(创作1288,翻译1016)的总数相差甚远。不知周先生所统计的数字是根据樽本照雄旧版原书,还是其他材料,姑以此存疑。

【初出：『出版史研究』第6輯1998.2】

锲而不舍 金石可镂

——读《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后

汪家熔

—

书桌上有一部 1100 页厚、重达 2.5 千克的大型工具书《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它是日本学者樽本照雄 1988 年后化 9 年苦功完成的。它称“新编”，缘由在此之前还有初版《清末民初小说目录》。那是 1985 年开始由樽本和中村忠行、中岛利郎、山内一惠，并由松田郁子帮助，化了 3 年多时间完成的。《新编》是在此基础上的增补(包括部分修订)本。“初编本”收录 9851 种我国清末至 1918 年的翻译和创作的小说，包括这些作品后来的不同版本(不包括“印次”)。这是个相当大的数字。他们几位开始时估计至多能收集到 3000 种。而《新编》竟增补到 16046 种，为“初编”的 162.8%。我们知道，历史性目录收集到 80% 是很难的，而在此基础上每再增加 1 个百分点都要化极大力气。去年我曾请樽本君将他的一篇文章给我一个中文本，以便在国内发表。每位作者大概都愿意自己文字被译载，而提供需要的文本，而这次他说因为《新编》而抽不出时间，可见这个 9 年他是全力于此，才能获得增加 64.5% 的成绩。

“初编本”出版后，就受到日本和我国文学界的关注，评语极

佳。《文艺报》1988年第12期、《日本国会图书馆月报》第333号都有文章介绍。都说是阿英《晚清小说目》1957年增补版以来30年来收录最为完备的近代文学著作目录。《新编》收录如许,恐怕极接近我国近代小说历史全貌了。它收录了能找到的一切小说单行本、汇编本和杂志上发表的。这方面遗漏的恐怕不会多了。如果还要补充,那就是报纸副刊上发表的作品了。阿英的小说目、江苏社科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的《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收书都仅以千计,樽本原先估计3000,而《新编》达到1.6万,说明原先虽研究有年而“底数”尚不清楚。1.6万种中,创作11074件,翻译4972件。阿英和明清小说中心收录所以少,缘由基本以“见”为标准,就难于说清楚现代小说全貌了。

《新编》比“初编本”不仅收录品种更完备,且著录内容也丰富很多。最重要是增加了著录根据。一个有限的专题能收集到1.6万多个题目,只能用“知见书目”的办法,即不仅著录编者亲眼见到的书(包括胶卷),还著录编者未曾见到而他人见到的书。前者称“见”,后者称“知”。而知见书目最重要的是注明“知”的根据,才能使目录成为直接、间接都被见到的书目,——读者可以去复按。而“初编本”用个人电脑制版,容量限制,付印时没有注出处。《新编》添加了“知”的根据,据其它书目或其它书目也有著录者,都一一著录。这就给使用者很多方便。

所以说《新编》极接近历史原貌,在于它辑集了大量材料:实物、书目、工具书。我国近代小说流传到日本、欧洲,我国自然也有保存。自二三十年代迄今,我国有孙楷第、阿英、郑振铎、柳存仁等等学者在海内外寻访,获得很多书目、访书记等成果。近年大陆、台湾以丛书形式新出稀珍近代小说,化身千百。国内近年,尤其是近代出版中心的上海,收集近代图书最多的上海市图书馆编辑的《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等于公开了其大量有关书刊情报,樽本教授获得极方便的利用。由原文化部

出版局版本图书馆收集资料、北京图书馆编辑的《民国时期总书目》收录了上海、北京、重庆三大图书馆的收藏。日本研究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学者实藤惠秀，在三四十年代之交在华广泛收集了我国近代出版物，还编辑了中国译日本书目和日本译中国书目，两书目后来又经香港谭如谦和小川博的增补。而其“中译日”对小说书目就很有用。这类条件，实有利于完善近代小说总目的编纂。但坚持不懈 10 多年收集资料、著录、考证、汇集之功实可钦佩。

近代小说与出版的关系，和古代小说与出版的关系很不相同。古代小说只有在较广泛传抄后才被出版业接受。而近代小说却和出版，首先是报刊有不解缘。可以说是互为依存的。清末的报纸杂志为吸引读者而连载小说。较后，1902 年梁启超首办《新小说》，开创了我国专门的文学期刊，但一般报纸、杂志仍然刊登小说。出版给小说以广阔的园地，这就是近代小说数量远远超过古代小说的缘故。脍炙人口的近代小说，几无一不是首先在报刊上连载然后集成单行本出版。所以，编辑小说书目不局限于单行本而及于杂志的路子是对的。《新编》对于研究近代文学史、研究近代出版史都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当然近代小说比古代小说发达，文人的观念变化也很重要。

“初编本”和《新编》除见到的实物外，利用的书目资料、工具书达 200 种。但“初编”和《新编》并不是将这些材料简单加起来，那样就不是一部学术性目录了。两者，特别《新编》，作了很多考订、研究工作。主要对翻译小说考订其原本。当时翻译不注明作者、原文。《民国时期总书目》对翻译原书作了些考订。“林译小说”，台湾马泰来先生在六七十年代之交在前人基础上做过较全面的考订。在本世纪初，商务印书馆除出版林译小说外，还有《说部丛刊》。我们知道这套书没有人研究过原本问题，而“初编”、《新编》作了工作。如《贤妮小传》，“初编”注了著者、书名的原文，《新编》加注了原书的出版年。这对使用者都是莫大方便。还有原来译本

上对原著者的姓名弄错了,如商务《说部丛刊》有《夺嫡奇案》,书上和目录上一直说是“日本柴四朗著,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译”。现在搞清,原著者是法国人,1866年出版;后来被英译;1888年底,黑岩泪香从英文译成日文,书名《人耶鬼耶》;中文据泪香译本译,译者也查清是文硕甫。这里化多少功夫。当时还有译、著不分的事。如包天笑有本“教育小说”叫《埋石弃石记》。历来书上和目录上都写“著”,70多年来从未有人怀疑过。“初编”对此打了个问号。《新编》加了个注,根据1971年包天笑发表的回忆录,肯定是翻译。类似的极多,不能一一。阿英《晚清小说目》中有21种翻译误写创作,有3种重复著录成6种,都得到纠正。

二

“初编”和《新编》实际是以樽本教授为主干的日本民间社团《[中国]清末小说研究会》研究的一个项目的前奏。这个项目是编纂一个我国近代小说史年表。当然年表是为小说史提供素材,所以书目是前奏的前奏。1985—1997年,13年功夫! 锲而不舍,其作风、精神值得钦佩和学习。文学史从书目,即普遍的调查研究基础上研究、提供基本线索开始,这方法是极正确的,它可以为全面展开研究而不局限于研究个别重要人物,提供了可能。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回想中国出版史研究开展已十六七年,各方面多有很大成果:一开始就有从古到今几本大厚本;大事记;一大批省市的出版史、出版志;许多高质量的论文;珍贵的回忆录和史料得到记录、整理和发表。成果非常丰硕。美中稍稍不足的是目录太少。

出版属于文化范畴。我们知道,“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新民主主义论》)。所以出版史,归根到底是传播文化的活动的历史。在有阶级的社会,一定的文化总是为了一定的阶级服务的。毛泽东讲:“至于新文化,则是在

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東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同上)。反之，旧文化则是为旧政治旧经济服务的。从辩证法的观点看，新旧两种文化不是分别生长在新旧两个不同社会，而是共生在同一时期，相互斗争，以对方的生存为自己生存的条件。否则仅存的那种文化就是无的放矢了。阶级社会中，每个阶级、阶层，都利用出版武器为自己阶级、阶层的利益服务，或表现自己。可以说，出版史的本质是研究在一定历史时期里，每个阶级、阶层、社团运用出版武器的状况的。在描述和归纳这种状态时，应以具体的、历史的真实，即当时的出版物作基础。我国历史上的出版单位，都没有为我们保存一分完备的样书。所以我们要化力气恢复历史书目：各个时期全国的、地方的、专题的、专书的、各别出版单位的。有了这些书目，我们就可“按图索骥”，找到这些书，我们的出版史研究就有可能从现在基本上是事业史、斗争史，进入到文化史的层次。而且这还是可以留给后来的研究者最好的“遗产”。

这 10 多年并非没有书目，而是相当少和不完备。化了 30 年功夫，基本完成了《民国时期总书目》，是个不可抹杀的基建大工程。但如吕叔湘所说，有两大缺点：一是仅仅著录 3 所图书馆所藏，二是完全不收录线装书，因而它不是国家书目而是 3 馆所藏民国时期“洋装书”出版物的联合目录。1982 年商务印书馆 85 周年编了解放前、后各一本《图书目录》。因为编集时间不够，前者实际以抗战前商务的《图书汇报》，即以“可供书目”为基干略事增补的。除因抗战前即已绝版各书基本缺漏外，最使《目录》读者失望的是没注明各书初版年月，这就不是一本恢复历史原貌的历史性目录。初版年月极重要。如商务目录里有孙中山的《孙文学说》一书，它在 1921 年孙中山刚写时出？还是 1927 年北伐后出？其意义大不一样。日本岩波书店就有一大厚本按初版年月排列的目录。这就告诉目录读者，它什么时候出了什么书，这才是历史。今年商务印书馆 100 周年，计划编一部百年分年目录，还历史原貌，且已工作

了好多年。非常遗憾,至今还未能杀青。中华书局在1987年出版了《中华书局图书总目1912—1949》。是利用北图《民国时期总书目》编制的卡片编的,因而它涵有了《民国书目》的全部缺点,连赫赫有名的《四部备要》这样大部头书,其初版本《总目》上也未列。开明书店和时代出版社两个历史上都有一定影响的社,都有“仁人志士”为之编了全目,且都注明初版年月。开明的印了,时代的没人出钱。此外,各省市出版志,见到有历史书目的,如江苏有一厚本,河北志里著录了古今各书。广西等好像也有,记不太清。专题书目除史学界作过,我们可利用外,其它都付阙如。这对我们出版史研究受到一定影响。

历史性书目对于出版史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编制、出版都有很大难度。但我们有特有的条件:便于组织,可扬长避短。吕叔老在评论《民国书目》时说,可组织各地图书馆补充。当时的条件是很难的。因在分类目录里查漏很难。现在简单多了:可使用电子技术将《民国书目》制成CD-ROM,就极便查漏。且变成CD-ROM后对读者更方便。关键是要领导重视,才能组织起来,而这正是目前出版史研究中最薄弱的一点:连一般文章发表的园地也少,更何论书目,虽然它是出版史研究的基本建设。奈何!

三

说到CD-ROM,我想对《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提一点建议。

“初编”和《新编》著录时都没用“标识符”。这就失掉了制作CD-ROM的条件。当然可以补做。《新编》有著者索引,读者只能从书名和中文著者两个途径检索。如果用标识符,制成CD-ROM就可以从更多方面,如出版者、出版年,译著作者、书名原文,这对研究历史是极有用的。

另外,有些一种书有不同版本的,都一一著录,这对于历史性

书目是极重要的,它反映了这些书受欢迎程度。但一种书不同版本的著录格式不必相同,第二以后各版本仅需著录与第一版不同部分,这可大大压缩篇幅。目录、索引等工具书都应遵循压缩篇幅的原则。未知对否?

如前所述,《新编》仅著录了书和刊,报纸副刊所载未曾著录。不能不说是一大缺陷。建议樽本先生和中国同志分工合作,分别查阅两国所存近代报纸,将小说书目补齐。对文学史和出版史将是极大贡献。

(作者系商务印书馆副编审)



【書評再録 1】——本誌第50号発行記念附録 (『清末小説から』第50号1998.7.1)

- 『新編清末民初小説目録』書評再録にあたって……………樽本照雄
- 樽本照雄《新編清末民初小説目録》読後……………王 学鈞
- 一位鍥而不捨的学者——介紹《新編清末民初小説目録》及
其編纂者樽本照雄……………范 伯群
- 对中国近代小説的新認識——簡評《新編清末民初小説目録》
……………郭 延礼

【書評再録 2】 (『清末小説から』第51号1998.10.1)

- 樽本照雄和他的《新編清末民初小説目録》……………黄 錦珠

【初出：『図書館建設』1998年第3期1998.5.20】

図書館建設 1998 年第 3 期

● 图苑杂识

从《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看到和想到的

汪家熔

1 日本在1997年10月初出版了一部1100页、重达2.5千克的大型工具书《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收录16046个条目。它是日本学者樽本照馆自1988年始，花9年苦功独立完成的。它称“新编”，缘由在此之前还有初版《清末民初小说目录》。那是1985年开始由樽本和中村忠行、中岛利郎、山内一惠，并由松田郁子帮助，花了3年多时间完成的。《新编》是在此基础上的增补（包括部分修订）本。“初编本”收录9851种我国清末至1918年翻译和创作的小说，包括这些作品后来的不同版本（不包括“印次”）。这是个相当大的数字。他们几位开始时估计至多能收集到3000种。而《新编》增补到16046种，为“初编”的164.5%（是我的统计）。我们知道，历史性目录收集到80%是很难的，而在此基础上每再增加1个百分点都要花极大力气。去年我曾请樽本教授将他的一篇文章给我一个中文本，以便在国内发表。每位作者大概都愿意自己文字被译载，提供需要的文本，而这次他说因为《新编》而抽不出时间，可见这个9年他是全力于此，才能获得增加64.5%的成绩。

《新编》收录的都是小说，不必按分类排列，只按书名、篇名的汉语拼音排列。题目用黑体，另换一行作译者名。再换一行出版者（刊物注刊名、期数）及出版年月，清末以干支纪年再注公元。作品集中的作品，注明作品集名称和编者、出版者及年月。翻译著作录原文。最后加注主要是我国学者的访书记、提要、书目、词书等中有著录者。日文称之为“典故”，即著录根据。因有著者索引，每个条目编顺序号，极易检索。对译著，特别为检索者方便着想，索引中中文、原文两见，是本无可挑剔的书目。

“初编本”出版后，就受到日本和我国文学界的关注，评语极佳。《文艺报》1988年第12期、《日本国会图书馆月报》第333号都有文章介绍，都说是阿英《晚清小说目》1957年增补版出版以来30年来收录最为完备的近代文学著作目录。《新编》收录如许，恐怕接近我国近代小说历史全貌了。它收录了能找

到的一切小说单行本（包括胶卷）、汇编本和杂志上发表的作品，遗漏的恐怕就是报纸副刊上发表的作品了。阿英的小说目、江苏社科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的《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收书都仅以千计，樽本原先估计3000，而《新编》达到1.6万，说明原先中日两国学者虽研究有年而“底数”尚不清楚。现在则有个较接近历史的实况了。1.6万种中，创作11074件，翻译4972件。阿英和明清小说中心收录所以少，缘由基本以“见”为原则，不收“知”。这就难于说清楚现代小说历史状况了。

《新编》比“初编本”不仅收录品种更加完备，而且著录内容也丰富很多。最重要是增加了著录根据。一个有限的历史专题能收集到1.6万多个题目，只能用“知见书目”的办法，即利用他人编制的二次文献。而知见书目最重要的是注明你“知”的根据，读者可以去复按。“初编本”没有注出处，这个缺点《新编》解决了，不论一种书有多少种书目著录，都一一注明。这就给使用者很多方便。

所以说《新编》版接近历史原貌，在于它辑集了大量材料：实物、书目、工具书。小说历来被人看作不登大雅，近代出版物又用西法印刷，双重不为藏书家看重，所以没有一个集中保存的地方。直到二三十年代，始被学者注意，陆续被收集。我国近代小说流传到日本、欧洲不少。自二三十年代迄今，我国有孙楷第、阿英、郑振铎、柳存仁等等学者在海内外寻访，获得很多书目、访书记等成果。近年，收集近代图书最多的上海图书馆编辑的《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等于公开了其大量有关书刊情报，樽本教授获得极方便的利用。由原文文化部出版局版本图书馆收集资料、北京图书馆编辑的《民国时期总书目》，收录了上海、北京、重庆3大图书馆的收藏。日本研究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学者实藤惠秀，在三四十年代之交在华广泛地收集了我国近代出版物，而且还编辑了中国译日本书目和日本译中国书目，两书目后来又经香港谭如谦和小川博的增

补。而其“中译日”对小说书目就很有用。这些等等条件,实有利于溥本教授完善近代小说总目的编纂。但坚持不懈10多年收集资料、著录、考证、汇集之功实可钦佩。

古代小说只有在较广泛传抄后才被出版业接受。而近代小说却与出版、首先是报刊有不解之缘,可以说是互为依存的。清末出现的报纸杂志为吸引读者而连载小说。较后,1902年梁启超首办《新小说》,开创了专门的文学期刊,但一般报纸、杂志仍然刊登小说。报刊给小说广阔的园地,这就是近代小说数量远远超过古代小说的缘故。脍炙人口的近代小说,无一不是首先在报刊上连载然后集成单行本出版。所以,编辑小说书目不局限于单行本而类及于杂志的路子是对的。《新编》对于研究近代文学史、研究近代出版史都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初编本”和《新编》除见到的实物外,利用的书目资料、工具书达200种。任何书目利用二次文献过多,都易出 $1+1=2$ 的毛病。但“初编”和《新编》并不是将二次文献简单加起来,那样就不是一部学术性目录了。两者,特别《新编》,作了很多考订、研究工作。主要对翻译小说考订其原本,当时翻译不注明作者、书名的原文。《民国时期总书目》对翻译原书作了些考订。“林译小说”,台湾马泰来先生在六七十年代之交在前人基础上做过较全面的考订。在本世纪初,商务印书馆除出版林译小说外,还有《说部丛刊》。我们知道这套书没有人研究过原本问题,而“初编”、《新编》作了工作。如《贤妮小传》,“初编”注了著者、书名的原文,《新编》加注了原书的出版年。这对于使用者都是莫大方便。这样注了的自然不胜枚举。还有原来译本上对原著者的姓名就弄错了,如商务《说部丛刊》有《夺嫡奇案》,书上和目录上一直说是日本柴四郎著,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译。现在搞清,原著是法国人,1866年出版,后来被英译;1888年底,黑岩泪香从英文译成日文,书名《人那鬼耶》;中文据泪香译本译,译者也查清是文硕甫。这要花多少功夫。当时还有译、著不分的事。如包天笑有本“教育小说”叫《埋石弃石记》。历来书上和目录上都写“著”,70多年从未怀疑过。“初编”对此打了个问号。《新编》加了个注:根据1971年包发表的回忆录,肯定是翻译。类似的极多,不能一一。可见不是二次文献不能用。从“初编”和《新编》的经验看,他们是将二次文献作为一种线索,进一步核实补充,就高于原来的材料。阿英《晚清小说目》共著录1004个款目,被订正的有91个款目。

再如阿英1954年的《晚清小说目》,是公认收录较全的,因而大家都以它为近代小说研究的根据。如1996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第12集第29卷《史料索引集1》中管林等编写的《中国近代文学大事记》中,记录的近代每年小说,以及其中创作、翻译各有多少种,完全根据《晚清小说目》统计,而阿英书目利用的材料却是不完整的,用他见到的材料复按,也是不全的。如他收录了《新小说》、《绣像小说》等清末5种小说杂志的作品。但他并未全收,也研究不出他收与不收的标准。他漏收了大量创作,如5种刊物共发小说248种,而阿英著录了82种,仅33%。在他的《晚清小说目》中共著录1004种,其中创作414种,翻译590种——翻译多于创作。所以阿英在他的《晚清小说史》中说:“如果有人问,晚清的小说,究竟是创作占多数,还是翻译占多数,大概只要约略了解当时状况的人,总会回答‘翻译多于创作’。就各方面的统计,翻译书的总量,总有全数量的三分之二”(274页)。根据不完全的材料得不出正确结论。实际上,据溥本先生《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録》的著录,我们统计,以《晚清小说目》著录的时段1873—1912,共有创作1531种,翻译1101种——创作多于翻译。其实,从《新编》核,阿英在编5种期刊中剔除未收的加进414种里,创作、翻译就相平。

2 书目是图书馆工作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且不能停留在公务和读者目录上。有条件的馆应该根据馆藏特点,编一些有特色的专题目录。而任何图书馆馆藏都不可能很完备,所以专题书目贵在用联合目录形式,这是使专题完整的唯一办法。联合目录的汇总人,他的工作内容实际是二次文献的汇总。联合目录水平的高低,关键在于汇总者的核实补充水平。

目录工作,在五六十年代有过一个高潮,编辑了一系列专题目录和联合目录。以北京图书馆为中心,编辑西文各科联合目录和西文新书联合通报,目的在于充分利用有限的西文图书资源。北京图书馆还编辑了《1833—1949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以上海图书馆为中心,编辑出版了《中国丛书综录[联合目录]》;以其收藏近现代书刊丰富的特点,编辑了《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録》、《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録》。顾廷龙馆长设计、组织的《丛书综录》,由于对版本理得十分清楚,具有了多方面功能,不仅仅是联合目录,而是宋以来丛书的总账,后来也是由顾馆长主持的善本总目,不仅是全国善本的总账,也已是历代藏书目录的总结。

六十年代初,文化部出版局给出版局版本图书

馆下达命令,着手编辑民国时期总书目。这个事情是计划影印《申报》引起的。《申报》自1871年创刊后至上海解放基本没有停过,是份重要史料,值得影印。出版局一位领导提出,可以《申报》所登书籍广告辑录成民国时期,或解放前百多年的书目。这是一个“知”书目,为何具体进行时变成了“见”目录,不得而知了。版本图书馆和上海出版局抽调20多位同志开始在上图抄卡片。差不多抄完,“文革”开始了,也就偃旗息鼓。“文革”中版本图书馆并入北图,形势变更后,版本在北图经手其事的同志提议将卡片从上海运京,由北图继续编下去。这就是《民国时期总书目》。他们的编纂十分认真,一半以上的书写了书目性的提要。他们自己提出了写提要务必做到准确、扼要、客观。从《总目》看,他们做到了这3点。叶圣陶说:“编纂者自觉地提出追求的目标,这种认真的工作态度,也是值得大家学习的。”他还肯定:《总目》“将为研究查考民国时期的各种资料提供极大的方便,对我国学术活动的开展和提高大有帮助。”这看法是适合一切有水平的书目的。1986年《总目》第一个分册《语言文字分册》首先出版。出版前曾请吕叔湘提意见。吕老细看后以自己的藏书中相应的语言文字部分作了补充。我统计:原有3586个款目,他增加了275个,即7.67%,变成3861个。分析他补充的,“9·18”后东北出版的最多,有109种;其次上海出版的78种;北京、广州等地出版的70种;解放区出版的18种。所以吕老认为《总目》有两个缺点:一

是仅仅著录3折图书馆所藏,二是完全不收录线装书,因而它不是国家书目而是3馆所藏民国时期“洋装书”出版物的联合目录。对这两缺点,吕老说,可组织各地图书馆补充。当时的条件要做到是很难的,在分类目录里查漏是很难的,现在简单多了;可使用电子技术将《民国总目》制成CD-ROM,就极便查漏,一个基本完整的民国书目唾手可得。当然要组织,并在经费上有一定保障。

3 这几年书目工作极消沉。有一种说法:马上要上网络了,书本目录已落后了。我想,电脑化已指日可待,但电脑是要有资料录入才能输出信号。传统的书目编制工作仍然是书目情报的基础,只是最后的载体有所变化。书目为学术研究提供必要情报的重要性,不会变化。

我读《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有很多感触。其中很深的一点是溥本教授能取得近200件可供利用的资料,一部分是他多年从事此项研究积累的材料,然而极大部分是我国出版的,有的很新。当然他的勤奋是基本的,但日本的学术情报体系之健全、高效,看来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社会没有完善的学术情报工作,学术研究是很难扎扎实实的,或者事倍功半。总得先知道有些什么材料可用,研究才能开始。提供完善的学术情报,我想这或许是我们图书馆工作者当仁不让的义务。

[收编日期:1997-11-08 责任编辑/毕红林]

【初出：『読書』1998年第7期1998.7】

| | |
|---|---|
| 近 | 代 |
| 小 | 说 |

知 多 少

夏 晓 虹

检点一百年来的中国文学，小说的异军突起、后来居上，无疑是文学史图像中最抢眼的景观。而八十年代以来，力求打通近、现、当代的时段划分，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把握的新思路的建立，则使“回到晚清”成为具有合理性的历史叙述方式。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热心穿越“五四”的边界，到受冷落多年的晚清寻找新文学的源头，并确实收获甚丰。研究者已经发现并论证，小说观念的改变、创作的繁荣，均始自晚清。这当然主要是以文学创作的主体文人社群为考察对象得出的结论。在这一场文学变革中，“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说法的流行起了重要的作用。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忽而身价百倍，竟然在文学殿堂中高踞第一把交椅。小说写作也成了名利双收的事业，赢得众多知识者的青睐。

晚清小说的兴盛肇端于梁启超的倡导，是当事人提供的一个重要证词。而其描状小说创作与翻译的繁盛景况，虽穷形尽态，却无夸张失实。不过，那毕竟只是同时代人的感性记述，尚不足以作为精确研究的依据。小说林社的主将徐念慈倒是有心人，曾经调查一九〇七年的小说出版情况，制成一表，统计所得，为一百二十二本。但此乃徐氏“以一人耳目所及”（《丁未年小说界发行书目调查表》），不免漏略；且仅止一年，无法涵盖全体，晚清小说的总数仍不可知。最早致力于晚清小说研究的阿英，资料收集既富，并尝编纂《晚清戏曲小说目》，所言应最具权威。他对晚清小说的保守估计是，“到现在我们还能知道的印成单行本的小说，至少在两千种以上”。他很看重这个基数，认为：“这是我们研究晚清小说应有的一个基本概念。”（《略谈晚清小说》）这已经较其一九三七年刊行的《晚清小说史》估量的数字，“至少在一千五百种以上”高了许多。不消说，数目的增长标示着研究的深入。

作为文学史家，阿英自是言必有据。可惜，一九六三年，当他重新估计晚清小说单行本数量以后，未能有机会再次修订初版于一九五四年

的《晚清戏曲小说目》。假如根据一九五七年增订本计算,其中的《晚清小说目》所收录的创作与翻译作品,共有一千一百零七种,离两千种之数尚相距遥远。这不禁让我们慨叹,用心之专、用功之勤如阿英者,以一人之力,欲厘清晚清小说总量,亦有所不及,则此项工作之艰难可想而知。当然,由于“文革”这样的突发事件,打断了研究的进程,使阿英终于无法将原目增补完备,也令人备感遗憾。

正当国内研究中断之际,远在日本的樽本照雄先生却选定晚清小说研究作为毕生事业。不仅个人专心致志,而且有鉴于研究对象的庞杂、研究者的分散,立意创办专门的学术刊物,以集结力量,集中展示学界的最新成果。一九七七年十月,取名为《清末小说研究》(第八号起改名《清末小说》)的年刊创刊号出版。在《编者手记》中,樽本先生明确地界定了刊物的性质:“本刊发行的目的有二:其一,是为我们这些清末小说的研究者提供发表文章的园地;其二,是包括了基本资料的整理。”起初,杂志的作者尚限于日本一隅;而从第三号开始,中国学者亦加入其中,并且,撰稿人的范围不断扩大,以致大洋彼岸的美国也有稿件传来,使这本刊物真正具有了国际性。至今,《清末小说》已出满二十期。此外,与之相配套,《清末小说特别通讯》(《清末小说きまぐれ通信》,不定期)与《清末小说通讯》(《清末小说カグ》,季刊)也先后面世。前者始行于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共出五十期;后者接踵而至,改为定时出版,篇幅扩充,自一九八六年八月发刊,今年一月印行的已是第四十八期。与《清末小说》之刊载长篇论文、考证、辑佚及资料编目相区别,通讯类简报多半以短论、会议报导、资料发现及考证、书评、近期研究目录(包括大陆、港、台与日本、韩国)为主。这些刊物虽然均署作“清末小说研究会”的出版物,而实为樽本照雄先生一人包办,从约稿、编辑、排版一直到邮寄,无不如此。二十年来,一以贯之,尤为难能可贵。台湾学者魏仲佑评论樽本,称“其对清末小说之研究用心之苦,付出力量之多,研究之勤劳当今世上不做第二人想”(《清末小说的研究在日本》),确为中肯之言。

凡自认为有研究能力的学者,总愿意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用于个人的著述,而尽量减少分身之务。樽本照雄先生却不然,在频频发表论文,并结集出版了《清末小说闲谈》(一九八三年)与《清末小说论集》(一

九九二年)的同时,不但肯以一己之财力支撑两种刊物,而且乐意在“为他人作嫁衣裳”一类的事务上大力投入,亦属难得。编杂志一节已见其精神,编资料在他也是当仁不让。

不言而喻,基本资料的掌握为任何研究的基础。在进入某一专题时,研究者总是希望有相关的工具书可以查阅,以发现线索,因为无论如何博览,一人所见终归有限。因而,工具书的相对齐备,也可视为衡量学科发展水平的一项指标。不过,编纂提供基本资料的工具书,费时费力,也不易讨好,遗漏、错讹在所难免。何况,资料公开,方便了众人,个人便不再享有独得之秘的专利,或竟有益于人而不利己,身在其中的研究者未必无所顾虑。辛辛苦苦得到的材料、考证的结果,别人随意引用,却连注释也不加一个,这在学界并非罕见。有此种考虑,资料类工具书于是成为千呼万唤而少有作者的学术工程,我们毕竟还生活在需要计算投入与产出比值的经济社会里。晚清小说目录的长期无人续修,也可于此中得到解释。

因而,当我看到樽本照雄先生独力编成的《清末民初小说目录》一巨册时,既为包括自己在内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者汗颜,又为学界从此拥有了一本可资参考的工具书而庆幸。樽本作此书,可谓数十年磨一剑。初版刊行于一九八八年三月,经十年之积累,一九九七年十月,又出版了修订本《(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

在该编新序中,樽本照雄先生明确地将一九〇二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的《新小说》杂志作为划时代的界标,因此,前后两本目录均以一九〇二—一九一八年间发表的小说为主。把清末与民初小说视作一个整体,符合历史的实际,也反映了目前学界的体认。自从梁启超在《新小说》第一号刊出《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提倡“小说界革命”,众多文人学者跻身小说家之列,翻译、创作如火如荼,一如吴趼人所描述。而民初小说的日益商业化,看似与清末的政治化殊途,实则仍有内在联系。梁氏为论证小说有益于社会革新而提出的“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在提升小说等级、用作启蒙工具的同时,也使小说的著译与出版成为有利可图的行当。辛亥革命后,帝制推翻,民国建立,小说作者原有的政治激情消解,写作与翻译的娱乐性普遍加强,出版的商业色彩于是更加凸

显。以致一九一五年,梁启超总结十余年来的创作历程时,竟厉斥“小说界革命”的产物“新小说”为害社会:“近十年来,社会风习,一落千丈,何一非所谓新小说者阶之厉?”此“新小说”并未达致梁氏当年的期望而走向堕落,虽令其痛心,而将“什九则海盗与诲淫而已,或则尖酸轻薄毫无取义”这游戏文的“今之所谓小说文学者”,指认为“新小说”之流亚(《告小说家》),却并不含糊。据此,清末与民初小说原是一脉相承,在当事人已认作自然的事实,尽管评价可以有高低。而将民初纳入视野,则使《(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在小说类工具书中独树一帜,比之此前问世的《晚清小说目》(阿英)、《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提要》(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明清小说研究中心)之截止于一九一一年的时限,又加拓展,有补阙之功。

若就编辑体例而言,樽本照雄之小说目录与阿英的最大不同处,在于兼收杂志上发表的短篇。为适应社会的多样需求,近代报刊除连载情节曲折的长篇说部“放长线,钓大鱼”,以招徕读者、扩大销量外,也推出一次刊毕的短篇小说,慰藉急于知晓“后事如何”、不耐烦总是等待“下回分解”的看客。见于一八七二年五月二十八日《申报》(该报创刊于同年四月三十日)上的《一睡七十年》,即属早期此类作品中的一例。短篇小说于是脱颖而出,在清末民初的报章中地位日形重要。阿英的《晚清小说目》虽也收录短篇小说集,毕竟数量微少,如初版《晚清小说目》收创作四百六十二部,其中注明为短篇集的不足十种,自不能反映其时小说写作的全貌。作为书籍流通的小说与报刊登载的作品原有不同的读者期待。近代短篇小说情节简单,多半经不起反复阅读,不能满足一卷在手、过瘾解闷的大众需要,短篇之不见好于小说书局,确有其特殊的理由。但如果据此得出短篇小说在近代创作萧条的结论,则是明显地以偏概全。有鉴于此,《(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主要借助上海图书馆编纂的《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大量录入初次发表于杂志的短篇小说,便使此编资料更为齐备,利用价值更高。而编目数量之所以达到一万六千零一十四件之巨,也与此一编辑方法大有关系。

在卷首《本书的使用方法》一文中,樽本照雄先生开列出的参考文献计达一百五十五种。在如此丰厚的基础上成书,因采集众长而一枝

独秀,其优胜地位自是十分明显。而依靠广取博观,及时吸纳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则是《(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得以处于学科前沿的保证。研究近代、尤其是晚清小说,最常发生的困惑,便是作者真实身份的确认。大部分作品在发表时,所署均为笔名,尤以创作为最。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或是沿袭旧习,仿古代文人“游戏笔墨”之意,以作小说为“小道”,不肯现出真身;或是抱深忧,怀大志,嘲讽世相,痛言改革,以致鼓吹革命,“笔无藏锋”,恐怕招来麻烦,落入牢狱,不得不隐去真名。更有一种特殊的情况,男性作者在涉及妇女题材的写作时,为酿造感同身受的亲切氛围,也乐于托名女士,令人不辨雄雌。而这些泛滥成灾的化名,无异为今日的研读设置了重重障碍。因无法判定作者姓甚名谁,是男是女,缺乏最基本的相关资料,研究工作往往会陷入迷途。特别是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盛行的时代,考证作者更成为立论的基础。因而,辨明作者作为晚清小说考证的要项,一向受到研究界重视。不过,由于线索散漫,资料湮没,考求需要耐心与敏感,有所发现实属不易。郭长海可谓此道中具备硬功夫的少数学者之一。他从报刊文献入手,仔细爬梳,屡有收获。如自《新闻报》、《申报》的广告与诗作中考察出,第一部长篇翻译小说《昕夕闲谈》的译者“蠡勺居士”本名蒋子让,重译者“藜床卧读生”为管斯骏;晚清重要的“社会小说”《黄绣球》的作者“颐琐”真名为汤宝荣,评点者“二我”乃陈其渊。又如,供职美国芝加哥大学的马泰来先生,以考证“林译小说”原本而见重于国内近代文学研究界。其所撰《林纾翻译作品原著补考》发表在《清末小说》第十六号,新勾稽出《天囚忏悔录》、《柔乡述险》、《怪董》、《俄宫秘史》、《九原可作》等六部林译原本。这些九十年代的考证成果,也很快纳入新编的小说目录中。

而我以为,《(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最可取处,在于其大量著录了翻译小说的日文原本情况。借途日本,学习西方,是近代中国寻求现代化的特殊之路。加之,中日两国有所谓“同文之便”,也加固了日本作为向中国输入西方文化中中转站的重要地位。小说翻译也不例外,晚清有中译本的日文小说数量空前绝后,译者争相角逐。即便是西方小说,此时也往往经由日本,转译为中文。已有的工具书,于注明译本源流上多有欠缺。在中国学界,为力所不及,情有可原。而唯一一本由香港与

日本学者合作编纂的《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实藤惠秀监修、谭汝廉主编、小川博编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一九八〇年),虽对此缺失有所弥补,但因两地资料有限,所录晚清著作,不少均未能标明具体出版年代,更大的遗憾,则是日文原作多半查无出处。应该说,日本学者在这一领域所能发挥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如在发刊之初的《清末小说研究》连载《清末侦探小说史稿》的中村忠行先生,即于此用力甚勤。身处当年文学传送站的日本,樽本照雄先生也自觉对澄清此段历史因缘责无旁贷。在占有地利优势之外,他更以自身坚实的研究功底,使这一工作日趋完善。由于汇聚了日本学者抉发考稽的大批日方原著版本,该编因而在资料翔实方面远远突过前人,领先学界。

不妨略举数例,以作说明。初刊于一九〇二年《新小说》杂志的《二勇少年》,阿英《晚清小说目》列入“创作之部”;《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已知其误,改正为“(日)櫻井彦一郎(译);南野浣白子(重译述)”,所注刊本为上海广智书局一九〇五年版;《(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则将杂志与单行本一并录入,又开列出日文译作的版本:櫻井鸥村译《世界冒险谭》第三编所收同名小说。再如署名“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译”的《(社会小说)巴黎繁华记》,《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失收,《民国时期总书目·外国文学》(北京图书馆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置于“国别不明的文学作品”之列,樽本所编目录则详注出:原作为法国 Fortune Du Boisgobey 所著“*Porte Close*”,英译本名“*The Closed Door*”,日本黑岩泪香译作《玉手箱》,三友社一八九一年五月十九日出版发行。而有关吴趸人(我佛山人)译述之《电术奇谈》的考证,尤能显示樽本先生的功力。此作首刊于《新小说》,署名一项所记颇繁复:日本菊池幽芳氏原著,东莞方庆周译述,我佛山人衍义。吴氏自承:“此书原译,仅得六回,且是文言。兹剖为二十四回,改用俗话,冀免翻译痕迹。”(《〈电术奇谈〉附记》)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据此断言:吴书“已非翻译性质”。樽本照雄先生经过仔细查考,发现了菊池幽芳的原作。这部发表于一八九七年一月一日至三月二十五日《大阪每日新闻》的报章连载小说,总共七十五回,原名《卖报人》(《新闻壳子》);一九〇〇年,大阪骏骏堂又分前、后两编,刊行了该作单行本,而依照时间推算,方庆周

应是据此本译出。经过认真比较，樽本判定，吴趼人之作虽有添改，但仍大体忠实于原著（见氏著《吴趼人〈电术奇谈〉の方法》，《清末小说》第八号）。有此底蕴，目录中的相关注记自是确凿可信。

具备如许优点，《（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之为研治中国近代文学者必须参考的工具书，已不待言。而既为研究者的必读书，便当以精益求精的标准衡量之，于是尚觉此编有若干可商榷处，一并提出讨论。

关于著录体例，该编尽量收集了截止到一九九七年五月出版的各种清末民初小说版本，意在提供详备的资料；但由于除再版外，重排及影印本亦单独标目列出，便有眉目混淆之嫌，不利于准确把握此期小说生产的实况。如前些年使用一九八八年版《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时，虽知其收录近万件，却苦于统计确数之不易，曾发函求教于樽本先生本人，日后得其惠赐之《清末民初小说的种类》一文，已计算出一八四〇—一九一八年的小说品种实收七千七百九十二，差额的数目，即大抵因重版而出。以新版为例，吴趼人的名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屡经翻印，故著列有三十九条之多；苏曼殊行迹浪漫，多才多艺，二十年代以降，其书几度热销，《断鸿零雁记》因占四十一目。二种固为特例，却可见分列之病。窃以为，目录的编排可以采取同项合并的办法，而依发表顺序排列报刊及各单行本的版次，系于该书目之下。如此，则能令人一目了然（顺便提及，各种《苏曼殊全集》也可不必再单独列目）。自然，因书商的贪图赢利或作者的流亡身份、内容的涉及时忌，同书异名者亦时有发生，判定归属诚非易事。此则有待众多研究者的努力，而不能专责于樽本先生。

与体例相关的，还有对“小说”的定义。晚清的“小说”概念包含甚广，戏曲、弹词亦在其内，内涵大体与叙事类文学相等。梁启超等人作《小说丛话》，即起因于梁氏撰写的十余条读《桃花扇》笔记；李伯元编《庚子国变弹词》，也自称所用为“小说体裁”。（《庚子国变弹词·例言》）二者在分类日趋精细的今日，已剔除于小说之外。而《（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既著录了《庚子国变弹词》，也连载出嬴宗季女的《六月霜》与觉佛的《女英雄传奇》（均见于阿英所编《晚清文学丛钞·传奇杂剧卷》）等，却又并未将其时行世的弹词与戏曲尽数收入，不免显得体例不一。

此外，也有个别非叙事类作品掺杂其中。如梁启超节录的《松阴文

钞》，乃日本幕末时代著名政治家、教育家吉田松阴的汉文选；金一所著《女界钟》(目录中未注出作者及版本)，为晚清阐发女权理论的代表作；人尹郎编辑的《徐锡麟》，系汇集当年报纸刊载的徐锡麟一案有关报导、供词等而成。之所以误收小说目录中，推想缘由，或因沿袭前人之说，《徐锡麟》与《六月霜》二书，《丁未年小说界发行书目调查表》便已录入；或因其人也作过小说，李伯元、梁启超、金一即属此列，故牵连而及。又有传记杂入的情况，像武林印刷所印行、未题撰人的《女豪杰》，实为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传记”栏发表的《(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的翻印本，似应除外。此目亦因《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提要》收录在先而致误。

另有《女子救国美谈》一种也值得一说。此书在编目中分置两项，《女子救国美谈》项下注为“热诚爱国人编”，《贞德传》项下作者写明为“冯自由”，又有一参照目列出《女子救国美谈》一名《贞德传》，而前者标作翻译作品，后者则为创作，显然视为不相干的两本书。实则据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中《开国前海内外革命书报一览》所言，《贞德传》作者即冯氏本人，初刊于庚子即一九〇〇年。该书“又名《女子救国美谈》，系章回本小说，由《开智录》逐期登出。只刊全书四分之一，而《开智录》停刊，在上海有单行本”。因而，编目应将其合为一种，仍当归入创作类。

而以近代出版物数量之巨，凭个人之力，实难遍览无遗。间有差错，本可谅解；偶然漏失，也属正常。即如成都昌福公司一九一五年出版的《松岗小史》，便未见录载。此书为一长达三百七十页、四十回的创作小说，安素《读〈松岗小史〉所感》对其赞誉备至，许以“是最妙之政治小说”，“最妙之立志小说”，“最妙之家庭小说”，“最妙之军事小说”，“最妙之教育小说”，“最妙讽劝社会之小说”，“最妙之言情小说”，“最妙之实业小说”，“最妙之历史小说”。作者自署“觉奴”，据吴虞所撰序文，可知其本名刘长述。八十年代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时，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一见。

目录书欲求完善，原赖众力，故亦奉献一得之见，以答谢樽本照雄先生求全责备之诚。

一九九八年二月六日于京北西三旗

(《(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樽本照雄编，日本清末小说研究会一九九七年十月版)

10年をへて
あの『清末民初小説目録』が、あらたに出現する！
大幅な増補をしました

樽本照雄編

新編清末民初小説目録

B5判 約1千頁 限定200部 文部省学術成果刊行促進出版物 定価：本体33,981円＋税

1988年、『清末民初小説目録』を出版いたしました（中国文芸研究会と共同出版）。
研究界の注目をあびましたのは、他に類をみない収録数の多さが理由のひとつです。中国の『文芸報』では、阿英の「晚清小説目」以来、はじめての最も完備した目録だ、という評語とともに紹介されています。

爾来、増補訂正作業を続けています。このたび、旧版の約1.7倍にのぼる増補をはたしました。清末に限定すれば、収録する作品は、阿英「晚清小説目」の約2.4倍となっています。

書名を『新編清末民初小説目録』にあらため、研究者の要望に応え、少数ですが、出版いたします。

清末民初小説研究には、不可欠の工具書といえるでしょう。

『新編清末民初小説目録』の特色

1. 清末民初に発表された創作小説、翻訳小説を網羅しました。本目録の総収録数は、16,046件（創作11,074件、翻訳4,972件）です。
2. 作品名のABC順に配列していますから、検索に便利です。
3. 雑誌初出から、のちの単行本、さらに最近の復刻も収録しています。
4. 翻訳小説には、原作名、原著者名などを判明しているものは、すべて注記しました。
5. 目録類の二次資料に拠っている場合、その主な典拠資料名を明記しています。
6. 著訳編者索引により、人名からの検索が容易です。

清 末 小 説 研 究 会
日本〒520 滋賀県大津市打出浜8-4-202 樽本照雄方
<http://www.biwa.or.jp/~tarumoto>